



上海社会科学院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2013年5月6日第7期(总第152期)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B)0225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推进智库建设

为贯彻落实市委书记韩正同志调研我院时的讲话精神，努力把我院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库的目标。根据院长王战“出好题、做好题、送到位”的总体科研要求，按照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提出的打破所际界限、种好“科研大田”的工作目标，我院正组织全院科研骨干队伍全力攻关涉及国家发展战略、上海发展方向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今年以来，我院已分三批共推出了36项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重大问题研究，研究主题和内容为中心和上海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关注、具有重大战略和理论

价值、关系到当前和未来我国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二类是热点问题研究，研究主题和内容当前理论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改革等诸问题；第三类是对改革和发展中典型案例的研究，以此为重大研究课题提供坚实的实证性支撑。

上述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正按照“尊重研究规律、探索科研改革、建设智库导向”的原则有序推进。尊重研究规律是指重大课题研究项目的系列化、具体化。各研究课题之间关联度高，形成了系列化的研究体系，为今后研究成果的提炼和运用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同时在研究选题上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选择了一批切口小、能接地气的课题进行研究。探索科研改革是指积极推进科研组织方式的改革，形成科研组织新机制。其中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由院领导直接挂帅，以所为依托，跨所组织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各类科研人员参加。热点问题和案例研究项目则由有实证研究经验和能力的科研人员或相关研究中心承担，课题队伍的组织同样打破所际界限。建设智库导向是指在加强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专业化的社科院智库人才队伍体系。

(智库科研处)



▲ 党委中心组与海门市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

4月25日，党委中心组赴江苏省海门市就“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专题调研。党委书记潘世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洪民荣、副院长谢京辉、王振参加调研，海门市委书记姜龙、海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新叶接待中心一行。调研活动中，双方召开座谈会，听取海门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并通过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海门的历史文脉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样本，赵新叶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潘世伟围绕此次调研活动主题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城镇化建设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值得理论界研究，

如政府决策与农民意愿之间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力量、城镇化进程的合理速度、城市特色的确立等。实地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对做好理论研究及决策咨询至关重要，我院专家学者应该利用好我院与海门市合作建立的沿江沿海发展研究基地这一平台，更多地开展调研，实现学术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中心组一行还参观了位于海门市常乐镇的张謇纪念馆和全国最大的绣品专业市场“叠石桥家纺城”。

各研究所所长、直属单位、机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

(党委宣传部)

党委中心组专题调研海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经验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院处级干部竞聘工作顺利完成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骨干队伍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我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拓宽干部选拔视野，促使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我院在全院范围内通过竞争方式选聘处级干部。先后分三批共发布53个处级领导岗位，通过报名、资格审查、作竞聘报告、民主测评、组织考察、院党委集体讨论、提任公示和任前谈话等各个环节，40名同志

从64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走上处级领导岗位。

院党委对此次竞聘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处级干部聘期考核与调整工作小组，由院党委书记潘世伟任组长，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洪民荣、副院长王振任副组长，机关处室处长代表、院工会主席、研究所所长代表、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代表等9人任组员。院长王战和党委书记潘世伟始终关心该项工作的进展，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工作小组对竞聘工作作了精心组

织和周密安排，整个工作进程遵循程序严格、公平公正的要求，先后举行了23场处级干部竞聘会，考察谈话486人次。严格按照“党委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要求，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

这次走上领导岗位的40名处级干部平均年龄43岁，男25人，女15人。新提任处级干部24名，占总数的60%，其中正处级干部10名，副处级干部14名；“70后”12人，占50%，“80后”1人。

(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本期导读

我院对外合作交流取得新成效

>>> 详见二版

我院中标4项2013年度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

>>> 详见二版

新建研究所专题系列报道之二·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 详见二版

沟通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路还很长

——访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

>>> 详见三版

“我和社科院”征文有追求，就会有动力

>>> 详见四版

“履道含和”无往不利

>>> 详见四版

本刊特约评论

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统一

高子平

智库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依据，以应用研究为导向，通过理论性、实证性、应用性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事实是什么，需要怎么做。

1. 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智库因其现实使命而不同于高校，但必须十分清醒地恪守“学者”的本分，固守学术之源。没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只能是事务性的讨论，仅限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难以阐述“为什么”，亦即通常只能将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小视野的罗列，而无法剖析不同成因之间的内在关联及现象的形成机理，也就无法相对客观、准确地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办。

这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不仅研究工作难以持久深入，成果转化也将面临“天花板”，最易陷入只会写调研报告、不会写学术论文的怪圈，踟蹰于学术界的边缘，大大增加职业风险。

2. 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生的宏观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正在经历巨变。尤其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之后，“论点—论据—结论”这一传统逻辑架构的合理性逐步丧失，实证调研与定量分析将成为更多的学科领域的基础性的科研方法，并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适时适度优化能力结构（但又不能自我沉迷于数据堆砌）。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一切只能云山雾罩、天马行空。当然，这里的

实证研究远远不只是做几个调查问卷或者个案分析，还包括对于面上数据及相关信息的大规模采集，并形成一整套相对完整科学的实证调查方案，从而对所关注的问题有比较完整、准确的把握。以信息所海外人才信息中心为例，如果不能以事实型数据库建设为基础，准确把握海外人才发展的态势及趋势，从量化层面进行科学严谨的动态分析，逐步形成一系列的理论知识成果（研究专著、学术论文）和应用研究产品（数据库、专递、专报、媒体文章、调研报告、蓝皮书等），在理论研究及决策咨询中的“主动权”何在？

3. 以应用研究为导向。没有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只能回归到形而上的象牙塔，实证研究将迷

失方向（发达国家学术界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智库”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应用导向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决策咨询，而是需要对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重大战略选择及各种突出问题持有一份格外的关切和客观、建设性的理性思考。这就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研究的切入点怎么选，产品是什么，出口在哪里。同时，应用研究必须严格区分两种研究形式：一是决策研究；二是工作研究，或者说事务性的研究。如果过分强调政策建议的操作性，实际上是将政府部门的工作研究混同于实证基础上的决策研究，从而将智库混同于机关内的研究处室，对此需要保持一份冷静。

(作者系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走过两难

袁莹

我眼中，孟子是一个崇高又比较现实的人，因为他懂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基本道理。

读李国文的《文人的风骨》（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深感作者是我的同道和知己。他专门有一篇文章谈“鱼和熊掌”：当了政治家，有读侦探小说的爱好，有优美的文采，那是锦上添花，但如果硬要把自己说成是文学家，通常都要出洋相。乾隆一生虽然

写了四万首诗，其实等于什么也没写，不过是玩票而已，当不得真。至于刘邦，一生只写一首诗，更是偶尔为之。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或那样无法两全的苦恼，吃嘛嘛不香，累心累力，就是没有完全想通这个道理的缘故。事实摆在那里，什么都想得到，什么好处都不能将他拉下，要了“东”还要“西”，接下来还要席卷“南北”。怎么

可能？社会全部的利益、资源、机遇、幸运，总量有限，哪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有了，别人就没有，别人有了，你就只好空手。

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心态，舍鱼而取熊掌，得其一，就行了。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心中要有数。“稍有进展，也不必封自己是种子写手，些许进步，

也不必视自己为转世灵童”，既然已经得到了超出想象的尽可能多的回报，关起门偷着乐也就行了。如果得了一，还不行，还要得二，要所有人无一例外为你鸣锣开道，为你掌声雷动，这就是矫情了。这种矫情就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心理。拿官方的嘉奖，得民间的支持，有下里巴人的热烈拥护，又有阳春白雪的高洁清名。这样的人生，看着就很不靠谱。

这种时候重温一下孟夫子的古训吧，择一而从，方得幸福滋味。

我院获2项 市教委委托课题

近日, 我院研究生部、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各获得1项上海市教委委托研究课题, 分别为:《科研院所研究生发展战略研究》和《人口与城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此前, 我院参加市教委编写的“十二五”教育规划课题研究工作, 获得广泛好评。(李波)

城市人口所与 解放日报联合推出 “新型城镇化论坛” 栏目

为认真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城镇化发展的精神, 发挥我院智库研究的决策咨询作用, 提升我院学者在学界及社会的影响力, 近日, 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与《解放日报》联合推出“新型城镇化论坛”栏目, 旨在汇聚各方观点, 把脉新型城镇化。该栏目开设于《解放日报》“新论”版面, 院城市人口所负责向国家城镇化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权威人士、学者和我院专家组稿。平均每两周推出一期, 今年将计划推出20余期。第一期于4月10日刊登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度性变革》一文。(城市人口所)

我院对外合作交流取得新成效



▲王振一行访问京都产业大学

近日, 副院长王振率团访问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有关机构, 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合作关系, 取得了积极成果。访问团成员包括国际合作处处长李轶海、国关所常务副所长刘鸣、高兰研究员、刘阿明研究员。

王振一行在东京访问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等。王振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平塚大祐理事、林哲三郎理事、大西康雄主任等商定双方要尽快签订合作交

流备忘录, 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研究所副所长北野尚宏确定了科研合作方式和重点领域。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伊藤元重、理事加藤普、研究调查部长神田玲子等也表示希望与我院继续开展合作交流。我院访问团一行还与日本有关国际问题、政治经济、海洋政策的专家就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京都产业大学是访问团日本之行的重点之一。这是双方自2012年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以来, 第三次举行双边学术交流活动。京都产业大学校长藤冈一郎以及各位副校长分别出席了欢迎和会谈等活动。在该校世界问题研究所举行的“东亚区域合作与亚洲

地区安全”学术研讨会上, 王振作了题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经济战略”的主题演讲。王振还应邀在京都工商界组织的专场演讲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的演讲, 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兴趣。

王振还于近日会见了来访我院的英国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副校长兼社会人文学部部长麦戈儒(Anthony McGrew)教授, 双方就建立院校级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后, 我院副院长叶青、经济所所长左学金设宴招待外宾。叶青就研究生教育合作、人员互访等与外宾交换了意见。双方商定将尽快起草合作交流协议框架, 推动双方合作进程。麦戈儒还为我院研究生作了题为“全球化: 巨大的倒退还是全新的阶段”的讲演。

4月21日, 王振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和地区研究所所长苏尔哈特·努尔吉托夫, 就双方的学术合作交换了意见, 并对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交谈。(国际合作处)

我院中标4项2013年度 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

2013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评审结果近日揭晓, 自3月18日向社会公开招标, 截至3月29日, 共收到来自全市各研究单位的有效申请214份。经专家会议和面试

比选两轮评审, 确定28个课题组中标, 我院中标其中4项重点课题:《上海不同类型园区资源整合及联动发展思路研究》A卷(陈建勋);《“公共外交战略”对上海未来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

研究》(孙震海);《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B卷(李凌);《新形势下上海促进就业的机制研究》B卷(刘社建)。(智库科研处)

我院参加第二十三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4月19日至22日, 我院参加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社会科学》、《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史林》、《上海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政治与法律》、《当代青年研究》、《社会观察》、《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参与展出, 展示扩大了我院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学科科研处)

《中西哲学论衡》 创刊

由院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色学科主办、哲学所、外国哲学研究室承办的《中西哲学论衡》, 经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 日前正式创刊。

《中西哲学论衡》为年刊, 每年一辑, 由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色学科带头人、哲学所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余治平研究员担任主编。《中西哲学论衡》一律采用繁体字排版; 设有“西学探要”、“中学揽胜”、“融会贯通”、“多棱透视”和“哲海采撷”等栏目, 所刊载的论文, 其内容有纯粹中国哲学方面的, 也有纯粹外国哲学方面的, 更不乏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 其篇幅也稍长, 大多在两万字左右。该刊还是多语种刊物, 可以直接登载英文、德文、法文的学术论作。(哲学所)

新建研究所专题系列报道之二

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是我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中, 政治所建立完善了研究所的组织与管理架构, 积极推动学术规范、人才培养、民主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 规划并确立了研究所的重点发展方向, 完成了从院属中心到独立事业法人研究所的转变。

概况介绍

为服务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大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以及我院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需要, 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 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 2011年9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成立。其前身是2005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目前研究所共有编制25个, 现有在职人员11人。刘杰研究员任研究所所长。

机构设置

在建所过程中, 政治所抓住机遇, 加强管理, 积极转型, 进行了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与双向选择等体制机制创新。通过1年多的整合, 建立了由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公共管理等3个研究室和国际人权研究中心构成的全新的科研组织架构, 同时, 院党风廉政建

研究中心挂靠政治所运作。自成立以来, 政治所高度重视科学办所, 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组建和完善了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聘任委员会以及直属党支部、工会、妇委会、青年中心等组织与机构, 形成了“三重一大”事项工作小组、所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决策机制, 制定了一批新的规章制度, 有效保障了研究所的正常运行。

研究方向

政治所有着近十年的历史积淀和研究基础, 其前身可追溯到2002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主政治研究中心。2005年6月, 民主政治研究中心更名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2011年9月, 上海社科院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为基础, 整合社科院相关资源成立了政治所。建所以来, 政治所在总结和分析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基本经验的基础上, 坚持继承传统、改进不足、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发展原则, 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 开门办所, 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发展定位和研究方向。目前, 在三个研究室以及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的科研、教学框架设置下,

政治所着力整合本所科研人员、特聘研究员和硕士研究生三种研究力量, 以学术研究和政策需求为导向, 优化配置学术资源, 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国式民主”系列研究、人权问题研究、廉政建设研究等重点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和研究特色。

队伍建设

政治所拥有一支年轻化的科研团队, 平均年龄不到40岁。现有在职人员11人, 其中研究人员9人, 8人拥有博士学位, 包括1名研究员、3名副研究员。在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过程中, 研究所充分发挥中青年科研人员学术敏感性强、研究思维活跃的特点, 通过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等方式加强人才培养力度, 一批中青年科研骨干得到了较好的培养和锻炼, 展示了良好的发展潜力。青年科研人员自觉将自身的学术规划与政治所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确立了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中长期研究目标, 形成了一批在上海乃至国内有影响的特色研究领域, 诸如人权研究理论与政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法治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网络政治研究、劳工问题研究等, 都已在学术界和决策咨询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 建所

以来, 本所还通过定期人才成长分析和分类指导, 积极推进科研人才梯队建设, 通过团队合作、集体攻关、国情调研与挂职轮岗等多种方式, 着力提高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 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学术发展

政治所积极实施社科院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双轮驱动战略, 致力于将有学科支撑的智库研究与有智库导向的学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 政治所各项科研工作进展顺利: 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方面, 旨在全景记录和深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已连续出版10年; 在“中国式民主”研究方面, 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 政治所将以“总论”加“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第一批专著9部; 在廉政研究方面, 2012年政治所科研人员先后出版《中国式廉政: 道路与模式》、《中国廉政建设的路径分析》两部专著, 承担了上海市纪委重点课题“十二五期间上海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研究”; 在人权问题研究方面, 本所科研人员先后参与了两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人权发展蓝皮书》等国家级重要人权

规划和报告的撰写工作, 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目前, 本所正受中央外宣办委托进行“人权的中国道路”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2年期间, 政治所先后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淑丽副研究员的“欧洲民法法典化研究”)、两项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胡筱秀副研究员的“上海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实践的实证研究”和刘杰研究员的“完善反腐倡廉制度的实证研究”)、两项国家部委办课题, 结项了一项上海市课题(张树平副研究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此外, 2012年政治所还举办了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成立仪式暨“新阶段中国的政治发展: 理念、价值、路径”学术研讨会、“转型时代的政党与民主——世界经验与中国问题”上海青年政治学者主题论坛等重要学术活动。2013年, 政治所还将承办上海政治学年会和“《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显示出政治所扩大对外交流、提升社会影响力的一贯努力。

(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供稿)

沟通中国与世界 未来的路还很长

——访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

院报：您好，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今年3月在上海成功举行，我们了解一下作为具体承办本届论坛的中国学所负责人，您有什么感受？

梅俊杰：世界中国学论坛现在的规格不低，已成为学术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国家级平台，这对办会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届论坛是从去年11月延后到今年3月的，改期后我们等于在短時間內又筹备了一遍，所以，中国学所的全体人员非常辛苦，一直在连续作战。论坛的成功举行来之不易，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我们所只是具体的执行者，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到后期，依靠院内外许多部门一起在做。单从本院说，从院领导到院内各所和处室再到志愿者，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去年3月中国学所组建会上，潘世伟书记就强调，中国学论坛是中国学所安身立命之所在；组建会后，就在同一个会场，黄仁伟副院长马上向大家布置第五届论坛的筹备工作，此后他一直全程在抓；筹备当中，王战院长和潘书记也多次指导并协调；临会时，洪民荣副书记等院领导直接在场指挥。特别是，八个分论坛和三个圆桌会都调动了院内各所及院外单位的力量。这些都说明论坛的成功的确是四面八方团结协作的结果。

感受之三，本届论坛又有了一些可喜的创新点，包括国务院新闻办设立了一个分会专场；媒体投入量很大，研讨的同时全程进行知名中国学家采访会；征集了海外中国学新著，设立了中国学新书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论坛作了时间不短的报道；在中国学贡献奖之外，设立了中国学华人贡献奖；闭幕式上安排嘉宾演讲；与外单位合作设立延伸会场等等。感受之四，论坛成果需要通过扎实的后续工作加以巩固。中国学所现在就收集论文、整理观点，有几本书需要尽快出版，其中一本将由国新办向海外发布。从这个角度看，论坛工作已成为一项常年的连续性工作。而且，根据初步安排，下一届中国学论坛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又要召开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前期筹备工作很快将启动。

院报：有了这一届及之前的经验，相信今后的论坛会越办越好。

梅俊杰：后来未必居上，一切要靠努力。我觉得要让这样的论坛开得更更有收获，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进一步优化与会代表。当然，主题的选定、后勤的配套、媒体的报道、成果的整理等等也很重要，但核心的环节还是要邀请到有思想、有成果、有影响的参会者，这样才能保证会议内容的精彩，有助于学术进步和国际理解，也有助于舆论塑造和政策建言。潘书记曾向我们提出，要把两年一度的论坛开成两年中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方面最优秀专家、最优秀作品之作者的例会。这可以是检验论坛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往这方面迈进，论坛就会越办越好。

同样重要的是，要让论坛的产出最大化。论坛的精彩固然重要，但以什么样的成本取得这份精彩可能也需要考虑。这样看，适当规模的论坛我们可以继续开，特别是要按照国际惯例来继续开，但平时一些专题集中的小型讨论会和讲座会我们也不要忽视。大有大的效应，小也有小的效益。学术问题的讨论贵在集中和深入，一场思想上的盛宴与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假如要追求大的效应，不妨多发动媒体来参与。可以设想，假如论坛压缩正式代表数量，让每位专家有更多的发言时间，会上

的自由讨论时间增加一点，同时各会场上的听众及其与参会者的互动增多一点，再加上媒体的积极参与和会后的成果整理，这样的论坛一定会有更好的产出效益。现在的问题是大牌专家学者来得较多又太集中，往往难以利用好这笔现成资源，专家学者又可能觉得未必尽兴。所以我更倾向于“细水长流”，以便把每个人的智慧成果更加充分地挖掘出来。

院报：谢谢您介绍了论坛方面的情况。您认为在对外学术交流中，有哪些环节是学者们应该很好加以把握的？

梅俊杰：我现在的体会是，对外交流中首先要紧绷安全的弦。也许有人觉得我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实际上，我并不在私下里接触外国人，我只参与组织上安排的外事活动，只在获得组织允许后才接触外国人。我尤其不会私自接触外国使领馆人员或外国记者，也算是必要的自我保护吧，以前的教训太深刻了。从本质上讲，我觉得阅读外国的书报比起跟外国人打交道要有多得多的收获。人是肤浅的，书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真知灼见还是在书报里，那里才有分析而不只是消息。至于在正常涉外交往中，我觉得最好以个性化的面目来进行交流，以说理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外国人习惯的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立场。语言好只是一个方面，学术交流可能更需要对所涉问题的充分知识，以及对于对方情况的事先了解。

院报：我们知道，您的笔译和口译能力都很突出，请您给我们谈谈语言转换方面的工作和收获好吗？

梅俊杰：我本科读的是英语，毕业后虽然在大学教英语，但一直希望只把英语当工具来用。所以，我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世界经济史，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本院读了世界经济。我用力最多也最感兴趣的领域还是外国经济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总希望能够解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落后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要说自己的翻译工作，除了口译多为稻粮谋外，笔译主要还是服务于个人的研究。2008年，我出版了十年磨剑的《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在撰写该书过程中，我读到了不少国外优秀著作，这两年就在埋头翻译这些著作，总共完成了超过一百万字的译文。

目前，我在组织两套丛书，一套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外国经济战略家丛书”，另一套是商务印书馆的“国富丛书”。前一套丛书五册中，我本人翻译出版了《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和《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接着将撰写《李斯特：德国保护主义之父》。商务印书馆的那套丛书中，我手头正在翻译德国学者迪尔特·森哈斯的《欧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预计年底前交稿。在丛书之外，今年初我在华师大出版社出了本译著《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这也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专业领域之外，我曾给译文出版社翻译过《生态政治》和《写给无神论者》等书。现在经常有人或出版社拿书过来希望帮助译介，但我不准备分散精力，只打算在外国经济史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一二。

院报：在您翻译的书中，是否偏偏是专业之外的《写给无神论者》引起了很大反响？



梅俊杰：这本书是我到中国学所之前相对较空时翻译的，去年五六月份出版，半年来已连续印刷三次，发行了两万多册，快的话年内就将出版中英文对照本。这本书卖得好，一个原因是，原著者在中国已有了大批粉丝，此前国内译出了他的十本书吧，已经培育了读者群，这是拙译畅销的基础。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如今人们既坚定地站在世俗的立场上，又强烈地对宗教教怀有兴趣，希望从中获得智慧和慰藉，而这本书正好能契合这种状态和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得不说，我总认为国人的知识结构和阅读能力偏向于轻松软性的读物，不喜欢、不善于啃费脑子的坚深著作，在这个阅读碎片化、浅表化的时代更是这样。加之某种大环境的作用，国民往往对风花雪月、趣闻轶事、心灵鸡汤趋之若鹜，对经邦济世、求真务实、悲天悯人反而绕道而行。相对于本人《自由贸易的神话》没有引起应有的强烈共鸣，《写给无神论者》受到追捧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喜悦，反而彰显了当今学术和文化生态的无奈。

院报：既然如此，能否请您再谈一谈您所钟爱并看重的外国经济史？

梅俊杰：每个人都倾向于夸大自己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但就外国经济史而言，我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大学问。世界近代以来，经济力量一跃而为国际竞争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随之，经济学变身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与此同时，本是同根生的经济史却蜕化成了门可罗雀的“隐学”，这种现象未免令人兴叹。事实上，经济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经济学。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把经济理论当作“其言”的话，那么经济实践及其演化过程毫无疑问构成了“其行”。显然，即使不给热门的经济史泼冷水，也至少应该大大增加经济史的热度。可惜的是，包括我院在内，经济史在学科建设中都处于投散置闲、自生自灭的状态。

当然，也不能说经济史现在完全空缺席了，可是，本来不多的力量主要投诸本国经济史。然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本质上需要国外踩着领先者的脚印前行，中国如今的发展更需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着力重点应该放到外国经济史尤其是西方经济史上。放眼望去，经济学家却多缺乏世界史视野，历史学家又多缺乏经济学训练。于是，外国经济史成了我们民族知识结构中的一大薄弱环节，以致国人要么轻信某些时过境迁的定论陈说，要么甘于闭门造车摸石过河。既然我们立志追寻百年“中国梦”，在民族层面，就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和社会，则深入研究外国经济史、悉心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应该也是当务之急，这是中国与世界更高意义上的沟通。我想自己很快又会全力来做这项工作的。

言论

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智慧

周山研究员在我院的演讲摘录——南北朝时期，刘勰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慎独》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荃荪孤植，不以岩隐而歇其芳；石泉潜流，不以涧幽而不清；人在暗室，岂以隐翳而回操？是以戒慎目所不睹，恐惧耳所不闻，居室如见宾，入虚如见人。”自古以来关于道德自觉的众多文字中，这篇《慎独》写得最为精彩。这段文字，以岩隐荃荪之芳香、幽涧石泉之流清，譬喻人在独处时也应自觉保持其道德操守。文中的“居室如见宾，入虚如见人”一句，精辟隽永，成为后人道德自觉的座右铭。

“金砖机制”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关所焦世新认为——金砖国家在发展中深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之苦，在金砖合作机制建立时它们在联合声明中也宣誓要对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既然如此，金砖国家机制就提出与原有国际体系规范不同的，更能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新的、更合理的规范、原则和主张，其中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就是切实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突破权力政治的樊篱。只有对此做出了新的、成功的实践，才能使得金砖合作机制处于道义的高地，也才能真正为国际体系转型提供新的规范。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播东方主流文化价值

我院校长王战认为——为了更好地推广东方文化主流价值，建议将东方文化主流价值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视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建设，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信义仁智礼”给予定义和解释；从小培养国人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意识；让更多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熟悉和了解东方文化；重视和宣传中国传统节日的传统文化意义；恢复和强调中国公共传统称谓；推出具有典型传统文化内涵的国服；加强国家之间传统文化的交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播东方主流文化价值，推出具有全球影响的传统文化产品。

使雷锋精神的学习回归常态

中马所黄凯锋认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结合，积极倡导负责任、讲诚信的价值取向。应避免把雷锋精神看作统领一切的概念，也不能仅仅依靠雷锋精神来解决当前的道德问题。中国社会当前的难题是公正问题，公正与责任紧密相关。雷锋更多地应当作为做份外事的典范，但如果将道德建设的重点放在做“份外事”上，难言正常。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应放在“责任”上，即各守其位、各尽其职。

持续改革动力来自政府职能转型

经济所权衡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需要进一步明确改革主体和动力问题的阶段了。改革的动力取决于改革的主体及其行为方式和目标，改革的主体不明确，也就无法找到改革的动力。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先需要重新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问题，即明确谁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否有改革的动力……改革需要政府从放松管制和放权让利，走向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同利益主体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法制透明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性氛围，这样才能够真正持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创新。

我和社科院

有追求，就会有动力

胡晓鹏

时常听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对此，我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她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命运一词究竟应该指什么？经过考虑，我仿佛看到，命运是一种身份，比如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从小城市来到了大城市，从附属于土地的辛苦劳作中走进了四季恒温的办公室……似乎这种理解太狭隘，还不是命运的终极含义。或许，这里的命运还应该包含得更多。但无论怎样解释，人们憧憬的命运似乎都与美好的事物相联系，但在在我看来，命运就是知识积累和个人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体会成长中的艰辛与快乐、幸福与痛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命运的终极内涵。

实际上，在每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中，都会有不断变化的“理想”，我也如此。但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对理想的理解自然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暂时渴望达成的目标看作是理想，也可以把那种模糊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向往看作是理想，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人们有了理想，生活才变得有意义，学习和工作也才变得有动力。记得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所授课班级的同学问：老师，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时年少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将来能够成为博士生导师。虽然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但这一场景却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硕士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研

究生，并有幸与院内众多学术前辈相识。在每一次的学习和交流中，都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大家的风采、长者的睿智、前辈的关怀；也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逐渐地廓清了思路、发现了问题，也让我对学术研究充满了兴趣。今天当我回想这段往事时，我才真正明白，对于学界前辈的敬仰和羡慕，以及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才是支撑我走到今天的真正动力。

在最初留院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或许是还不够成熟，盲乱、急躁总来骚扰我。在不坐班的日子，每天都不停地在狭窄的空间里伏案写作，有时也颇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但每每成文，总是感觉不满意。每当此时，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担心是否自己真的适合做研究。虽然，有时也会幻想着自己能够滔滔不绝就某一问题发表宏论，但长期找不到合适定位而造成的心理压抑却使自己难以释怀。封闭、困惑、自卑、固执是这一阶段内心深处的最好表白。尽管与人交流时，还能自如应对，但我的总结却是：虽以笑脸拘应于世人，然内心充斥着彷徨。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也开始意识到戒焦戒躁、快乐做事是做好学问的首要环节。此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关注院内的研究动向，经常去聆听各类讲座、报告，也不断地向学界前辈请教；正是在这些有意或无意地交往和参与中，我感

觉到天空开始变蓝，学术研究也是件快乐的事情，而且自己的学术探索能力开始明显提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院里提供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我恐怕还在迷茫之中。

近几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推动下，社科院实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发展，无论是学科建设水平还是智库决策能力，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期间，作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我也逐渐意识到，理论研究必须要作到顶天立地——即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落地——才能够真正地发挥科研人员的作用，研究成果也才能够最大程度惠及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促成智库与学科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院内出台了多项鼓励和引导措施，我也因此在决策研究方面大胆的迈出了步伐。时至今日，由我所撰写的多篇专报先后获得了国家和市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当我为此取得的微小成绩而高兴时，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没有院领导自上而下的推动，单凭自己的理解是很难快速迈出向决策咨询方向的转换。

今天，我已年近不惑，在社科院也刚好工作了十个年头。回首十年来的成长历程，我收获了很多，也让我开始由衷地体会到“快乐和烦恼是并存的”真实意境，它们犹如一个灵魂，互相碰撞，这就是成长必经的路程。正是这一阶段的煎熬与磨练，使我真正地体会到了自强、自立、自信的重要性，也培养了我的忍耐力，并为以后的

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础。它让我知道，无论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够用心的投入，快乐和幸福就会如期而至的！想想，这是上天在我人生道路上特意为我安排的坎坷，这也是一种锻炼，锻炼我的心理和适应环境能力，锻炼我的心智和毅力，而这些将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一个新的台阶。

当前，我开始初步介入学术管理工作。这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有点迷茫，但我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我已意识到：“学术管理与学术研究是相通的，它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很大程度上讲，还应该是一种对学术的认识态度——不仅是个人对学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也是一种自发的、自觉的状态，还是要用一生去孜孜追求的研究过程，更是必要时勇于奉献的服务精神”。

古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和工作的这些日子里，领导、老师、同事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和帮助，在这里，我开始步入学术的殿堂，并一步步地走过来，也正一步步地成长着。在以后的工作道路上，我会牢记“感恩于心，回报于行”的箴言，用果敢的勇气去面对今后的人生，体会成长的快乐。因为有了成长，才使我真实地感觉得到我拥有的和拥有我的。

(作者系部门所研究员)

新书速递



《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

张茗著

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同志多次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但是众多读者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官员因为缺乏世界历史知识而遇到了阅读障碍。为此，人民出版社特别推出类似辅导读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和《托克维尔回忆录》。本书以时间为经、著作为纬，在介绍托克维尔的生平及时代背景的前提下，试图对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回忆录》和《论美国的民主》等三本重要著作进行全方位解读。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应用指南

王世伟 张涛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年2月

本书介绍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和过程、重要意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行业特点，从历史、法制、文化、哲学和世界的维度对《规范》进行了解读。本书采用了原文、解读、案例和图像相配合的具体方法，将有助于公共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广大公共图书馆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规范》条款的深刻寓意。



中-南亚地区安全报告(一)

胡志勇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3月

本书主要以中亚和南亚为重点，以地区安全为中心，全面分析和系统阐述了一年来的中-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就美国南亚政策调整及其影响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并集中探讨了这两个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分布、特征及相关国家反恐举措等。针对中亚和南亚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另外，本书还分析和探讨了中东“阿拉伯之春”及其影响。

方式，《周易》作者称之为“夬履”。夬，决，脱离之意；脱离实际，脱离工作团队，脱离广大民众。就象一支离弦的箭，一意孤行，决然而去。前途如何？“厉”，充满危险。

处身顶巅，尤需深思熟虑，谨慎处世；时时刻刻，都要与实际保持一致，经常作“有悔”的检点，使得决策、政令尽可能完善，避免“朝令夕改”，下属无所措手足。“视履，考祥其旋”，检点走过的路，检查即将出台的措施。思前想后，与世界保持和谐，是履道的最高境界。

(作者系我院研究员)

履道含和 无往不利 周山

在黄山脚下，有一个名为“西递村”的古民居，其中有相邻的两座院落，据说为兄弟俩所造，中间开了一个两家人可以互相走动的边门，门楣上题四字：“履道含和”。题得巧，意蕴深。

履为足，道为路；履道，即指这条两家走动的路。开辟这条通道，体现了两家人的和睦；两家人的和睦关系，又随着在这条通道上的不断走动，成为传统。这是在这条通道的门楣上题写“履道含和”四字的本义。

履，又引伸为礼；道，又为事物的本质属性；履道，即礼之道，礼的本质。“履道含和”的深层意蕴是：礼的本质中包含有“和”。和是平和，是和睦，是和谐。平和，和睦，和谐，是礼的重要属性。建宅者希望家人，希望子孙后代，在依礼而行的人生道路上，做人平和、待人和睦、处世和谐。

西递村的“履道含和”思想，源自于《周易》的《履》卦。《履》的卦象，内兑外乾，兑为和悦，乾为玉，玉为温润之物。温润其表，和兑其内，称名“履”。这个“履”，就是“礼”。所以，《履》卦是阐述礼的卦，是以“和”为主要内容的卦。

“履虎尾，不咥人，亨。”这是一个极端的譬喻。常言道：“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什么摸不得？因为老虎最凶悍的武器是尾巴，而尾巴就长在屁股上。踩老虎尾巴，显然比摸老

虎屁股的危险性更大。然而，遵循外润内和的礼，即使遇到如此高危的事情，也能安然通行。礼的作用，由此可见。

一个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循礼而行的态度、践履的方式，各有特点。

第一个阶段为发展的初期，亦即如何做人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践履方式是“素履”与“幽人”。素是无修饰的自然状态，素履就是未受社会不良习俗影响，完全出乎自然的那种内心纯净、外表敦厚的言行举止。这种践履方式，因为发乎天性，虽无礼仪规范，举手投足莫不中礼。

“幽人”之“幽”，喻心态的恬淡安静。稍有发展之后，仍需保持心胸坦荡、不求闻达的平和心态。处于这一阶段的人，最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出人头地的急躁冒进思想。一旦有了这种思想，自然也就失去了平和的心志，难免会做一些不能见人的非礼之事；一旦事与愿违，便怨天尤人。“履道

坦坦，幽人贞吉”，保持心态的平和，做坦荡荡的君子，不做常戚戚的小人。以这样的原则作为人生的起点，前程一定美好。

第二个阶段为发展的中期，亦即如何待人的阶段。做实业的人一旦成为富豪，入仕途的人一旦成为高官，大多会患上同一种病：骄人。骄人的姿态甚多，如：瞧人的目光、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甚至于在握个手的一瞬间，都能让人感觉到骄人的病态。在这些人的身上，礼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被金钱或官位所代替。可悲的是，这些富豪和高官并不感觉自己的失礼，反而认为礼是用来区分等级的，骄人的种种姿态，表明了富人官人的身份等级，正是礼的一种表达。他们忘掉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礼的核心价值是“和”，表现在待人方面，就是和气、和睦；骄人与和睦，背道而驰。

《履》卦的六三爻辞，同时举了四个例子，叙说骄人失礼之态的凶险后果：“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

武人为于大君。”目光斜视，虽然也能瞧见人，却是一种骄人之态。象跛子一样，走起

路来摇摇摆摆，并非本于残废，而是一种故作姿态。踩住了老虎尾巴，不以为然，结果被老虎咬伤。武夫篡位，君临天下。虽然只在老虎吃人的后面作出“凶”的判断，但是这四个例子属于并列关系，老虎吃人是明显的凶险，其它三种情况的后果不明显，却因为都是缺失和睦内核的非礼行为，结果的凶险同样可以确信。

同样的踩老虎尾巴，因为态度温润，内心又充满着歉意和不安，结果大不一样：“履虎尾，愬愬，终吉。”履虎尾，只是一个例说。无论是富豪，还是高官，都要以礼待人，有一颗尊重他人的和睦之心。有了这样一颗“愬愬”之心，人生旅途中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能够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第三个阶段为发展的巅峰时期，亦即如何处世的阶段。无论是做事业的富豪，还是从政的高官，一旦进入了巅峰时期，核心问题就要从如何待人上升到如何处世，着眼于整体利益，思考如何才能与整个世界保持一致，在和谐的环境中确保自己的巅峰状态。

这一时期的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自身。因为走到了巅峰，以为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过分地放大自己的能力和影响，造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形成了脱离群体、脱离民众，独断专行的工作方式。这种因财富和权力而被扭曲的性格与工作



▲水粉画《土楼》 作者 周菡(行政处)